

红色掌柜云

熊亮华 著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陈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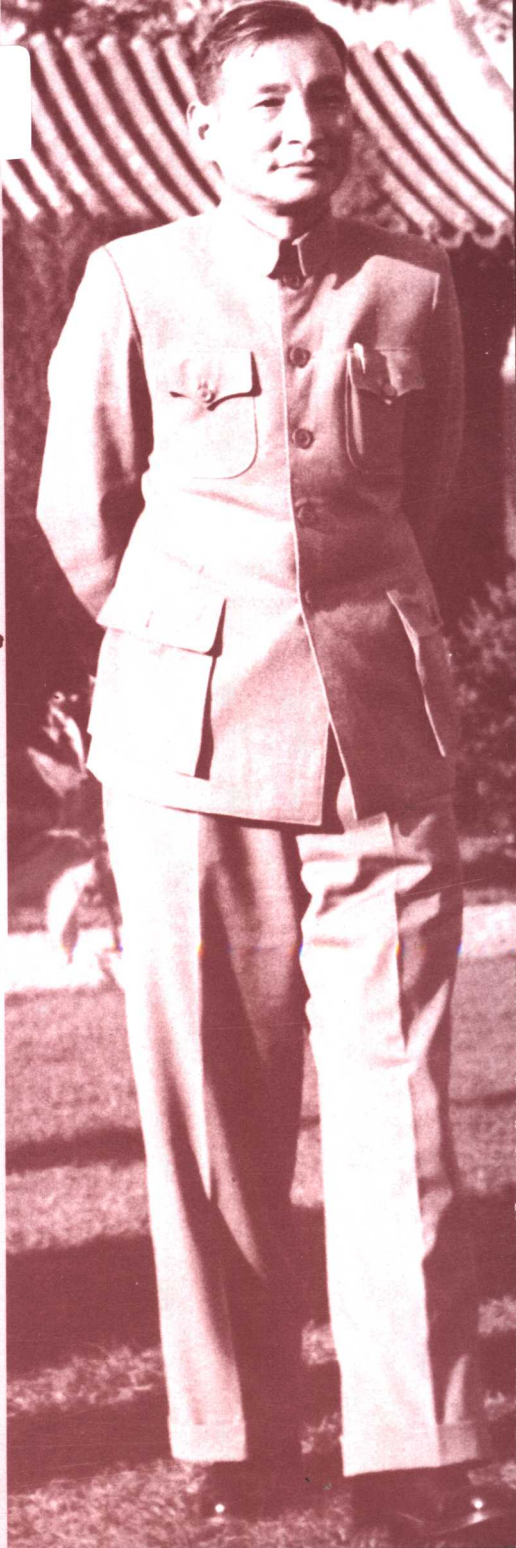


LT0000567914

红色掌柜

熊亮华

熊亮华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掌柜陈云/熊亮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6-04234-4

I. 红…

II. 熊…

III. 陈云(1905~1995)—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751 号

红色掌柜陈云

熊亮华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73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0.625
插页:3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234-4/K·430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熊亮华，1967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部副研究员，参加撰写《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陈云年谱》、《陈云传》、《彭真年谱》等，参与翻译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中译名《陈云》，作者（美）David M. Bachman）。

写在前面的话



1978年11月1日，
陈云在杭州玉泉茶室打
算盘。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一张陈云打算盘的照片题写的诗。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擘划的形象写照。

陈云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江苏青浦县（现为上海青浦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就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上任伊始，就给自己，也给所有财经干部立下了规矩：“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当然，陈云的“掌柜”态度，不是要像生意人那样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而是为国计民生精打细算。

在陕甘宁边区战时财政的条件下，陈云就要求财经干部对自己人也要“仔细打算盘”、“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

写在前面的话

丢脸的事情”。

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后，陈云更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甚至一度主张财政部门要像铁公鸡“一毛不拔”。他告诫财经干部：“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陈云所设想的，就是要把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说，花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在陕甘宁边区财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重生、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的制订、减少“大跃进”的损失并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后期打开外贸工作局面、三中全会后调整经济并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中，陈云都写下过神来之笔。

而这位一辈子为国计民生筹谋的当家人，掌管着出入动辄数以亿计的资金，自己的生活却是简朴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清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位的家庭比较困难是有名的，即刘少奇、朱德、陈云，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1995年4月陈云去世以后，身边工作人员计算了他留下的财产，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和去世后其家属可领到的抚恤金13360元。

陈云，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积余，而把有形的、无形的巨大财富，留在了中华大地上，留在怀念他的人们心中。

目 录

第一章

黄土高原上的“红色掌柜” /1

□生产发展了,财政金融却乱象频生,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请陈云出马执掌财经大权,破解难题 /1

□不让财政随便从银行掏钱,缕清法币边币关系,边币“偷梁换柱”一锤定音。新当家人一出手,就展示了过人的果敢与精明 /7

□反封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陈云足智多谋,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 /14

□总结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陈云告诫大家:要当掌柜,不要当出纳。出色的财经才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21

第二章

浴火重生的黑土地 /29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32

□从乡村走进城市,企业里的复杂门道让人犯难,陈云说是还没有学会做“老板”,主张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37

□战场硝烟未散,陈云率领的接收人员已突入沈阳市内。中共中央把接收大工业城市沈阳的成功经验转发各地 /50

第三章

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57

□物价猛涨,人心惶惶。陈云临阵受命:安下地盘试一试 /58

□外有敌人的封锁轰炸,内有投机资本的猖狂挑战。陈云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筹建财经统帅部,谋划迎战部署 /62

□开国刚半月就迎来最猛烈的物价风潮,陈云下令:这次要给投机资本一个教训 /81

□财经分散,收支脱节,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陈云疾呼:防止物价大波动关键在统一财经、整顿收支 /97

第四章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 /104

□有些干部想乘打垮投机资本的胜利之势一举消灭私人资本,陈云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何必那么急急忙忙 /105

□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114

□反对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百废俱兴。支持财政当铁公鸡难免得罪各路诸侯,陈云自有说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126

第五章

描绘“一五”计划的蓝图 /137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一边编制一边实施。陈云呕心沥血，逐项落实项目 /137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146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发挥市场作用，陈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己的道路 /158

第六章

忍辱负重谋大局 /174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并直言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陈云不得不再再检讨 /175

□各地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在各项计划指标上“放卫星”，陈云心怀疑虑，尽可能委婉地纠正“大跃进”运动中违反科学的做法 /183

□开始纠“左”，陈云对高指标的怀疑被一些人当作“右倾保守主义”，毛泽东却夸奖陈云“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钢铁指标 /199

第七章

为挽救经济危局百计营谋 /219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220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225

□农业支撑不了过大规模的建设。陈云力主动员两千万城市人口下乡 /230

□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说,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 /236

□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度过困难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 /247

第八章

打破极“左”框框 /257

□陈云放眼世界,直言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 /258

□通过交易所做期货不但完成了采购任务,还大赚了一笔,五丰行的干部却像犯了错误一样心神难安。面对责难,陈云想了一年,理直气壮:利用交易所并没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263

□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工业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受到极左势力百般阻挠。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267

第九章

再展雄风 /272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272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就提出要调整,抓住宝钢上下马的难题深入调查“解剖麻雀”,遏制冒进势头 /289

□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陈云赞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并把搞活经济和坚持计划指导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307

小结:陈云——富于创见的开拓者 /315



第一章

黄土高原上的“红色掌柜”

陈云的财经生涯，是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他自己曾不无诙谐地把这一段的财经工作，说成是搞“小摊摊”。

生产发展了，财政金融却乱象频生，党内外意见纷纷。

毛泽东请陈云出马执掌财经大权，破解难题

1944年3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其所任组织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西北财经办事处是1942年6月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主任是贺龙。

此前，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3年3月起因病休养，为时近1年。为照顾他养病，毛泽东让他从杨家岭迁到自己的住地枣园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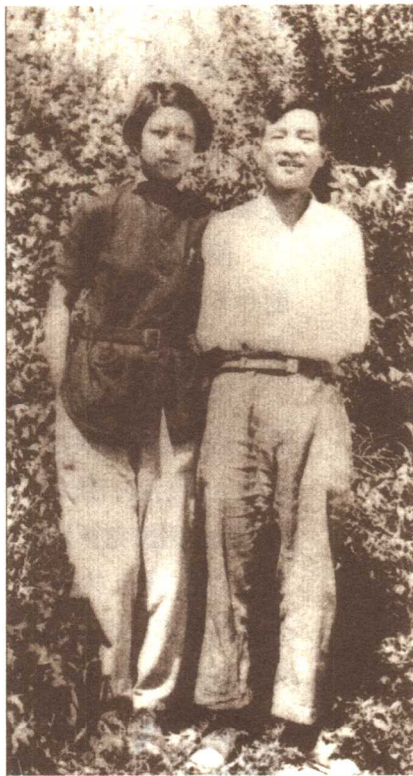
陈云此际走上财经工作领导岗位，有当时特殊的情况。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代工业，经济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大批党政军人口集中在这里，财政供应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极大的负担。抗日战争开

始，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国民党也多少拨给了一点费用，再加上其他一些捐助，边区依靠外援解决了很大问题，老百姓负担轻微。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日益表面化，边区边境摩擦事件不断增多，使中共中央感到外援已不可靠。1938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随即延安成立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组织生产。

身为组织部长的陈云积极带头。他和副部长李富春领导大家收集大量肥料。第一天积肥有些人不愿挑大粪，陈云就亲自去挑大粪，还高兴地说“大粪是香的”。别人对这句反常的话表示奇怪，陈云面带笑容地解释说：“将来把大粪去培养出新鲜的蔬菜和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消息传到各处，大家听说部长都带头挑粪，也就都不怕挑粪了。许多投奔延安不久的大学生也不嫌臭，



1938年3月，陈云
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红色掌柜陈云

放下了架子去挑大粪。1939年3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还报道了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生产运动,说他们创立了三大劳动纪律,一不无故不到,二不迟到早退,三因事不到须有人代替。各队之间发起劳动竞赛,开展互助互爱。这一年,边区收了1.76万多石粮食,蔬菜近230万斤。边区农民的总负担虽比往年略重,也只交5万石粮食。

但那时外援并没有断绝,延安的日子还不是太艰难,组织生产的问题并不迫切。1940年生产运动没有坚持下去,只收了3000石细粮、蔬菜90多万斤。

困难就在这时突然降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后,1940年3月,蒋介石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在边区周边构建5道包围封锁线,对边区贸易实行统制,并禁止边区所需的棉花、布匹等输入边区。从8月开始,国民党开始拖欠八路军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八路军经费,还禁止外界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边区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遭受水、旱、风、雹灾害侵袭,损失惨重。外援断绝,灾荒频仍,边区

收入大减。而境外遭灾害和战祸的难民又大量涌入,为保卫边区还从前线调回了一批部队,支出猛增。这样一来,边区财政经济空前困难。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

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1年,边区政府不得不向百姓征收救国公粮20万担,并要求他们承担公盐运输义务,群众负担突然增大,民怨四起。

为减轻群众负担,边区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1939年,陈云同李富春在延安。



大生产运动,种粮种菜,纺纱纺线,乃至经商办实业,实现了大部自给,度过了难关。1941年5月1日,中央书记处还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

这份决定是陈云为中央起草的。当时,一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只重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某些党员甚至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被分配做经济和技术工作时还讨价还价。陈云提出,应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的分配。另一方面,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和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陈云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掌握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陈云指示把这份决定贴在中央组织部的门前,好让每个来组织部的干部都能清楚地了解。组织部门挑选了许多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对保证边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度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1943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超过计划一倍,不但自给,而且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原来靠输入的皮毛、铁、纸、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品,能够大部自给或者自给有余。边区经济正逐渐脱离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边区经济蒸蒸日上,与国民党区域压榨老百姓而造成经济衰败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

但是,与边区生产兴旺景象极不协调的,是财政金融的混乱。1943年1年就出现了好几次大的金融物价波动。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

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为金融物价大波动埋下了隐患。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账;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应付战争,军事费用开支剧增;为了保证冬衣原料供给,又必须及时收购棉花;而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出境销售,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减少。

上半年,边区流通货币——边币发行了23137万元,边区金融物价已经开始波动。财政部门掌握了金融、贸易大权后,不是从边区经济全局出发,仅仅为应对一时的困难和危局,下半年边币竟然发行了143663万元,是上半年的7倍还多。边币发行的过快增长,刺激金融物价剧烈波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顿起,物价暴涨。

7月以后,边区物价猛涨,法币对边币黑市比价也猛涨。8月至12月,延安法币黑市价格由4元涨至10元(牌价仅2.1元),物价也涨了三四倍,仅9月份就涨了68%。金融物价发生的强烈波动,引起社会生活不安,有的地方公开使用法币、白洋或以法币议价,排斥边币。边币币值大跌,信用受到重创。法币趁机抢占流通市场,黑市价一路攀升,到10月份,连边区的盐业、土产两公司都不收边币而要法币了,银行全年因死守2.1元的牌价兑换法币,损失27891万元,物资局因固守牌价损失20万元。边币发行、物价、财政预算增长陷入恶性循环。

党内外对这种状况颇有意见。毛泽东除提议任弼时组织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外,待陈云身体稍有恢复,就请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出面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陈云过去并没有搞过财经工作，但他有唯实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为基础，并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养病期间，他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认为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弄清事实，做到实事求是，他概括了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以此为终身的准则。



1943年12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唯实和学习，就是陈云进入新的工作领域的随身法宝。在被确定主抓财经工作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号施令，而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1943年12月9日，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随后，就开始接连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供给座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级干部会议